

一 知行统一： 时代与历史的思考

我们站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心潮澎湃。回眸 20 世纪，改革开放的 20 年是中国历史上发展最快的 20 年，它给古老的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东方雄狮的觉醒，令世界瞩目，也令每个炎黄子孙引以为自豪。展望新世纪，尽管前进的道路上还会有荆棘，但前景是灿烂辉煌的。作为跨入新世纪的中国青年，如何正确认识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和青年时期的人生特点，从而把握正确的人生方向，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从伦理意义上说，知是对社会与人生的认识，主要指的是正确的认识，是人生的理性之舵，但将知诉诸行动，则又要受到情感、意志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在交织着感性与理性的人生思考中，从知到行、并最终达到知行统一，正是主体孜孜不倦地攀登道德阶梯，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它是人生轨迹、道德发展的真实记录。历史上各种思想家在知行问题上各抒己见，或曰知难行易，或曰知易行难，然而生活的实践昭示人们，对社会与人生的正确认识固然不易，但要做到知行统一更难。要理解这一点，不能不从复杂的社会生活分析入手。

1. “爬坡”与“滑坡”之争

“爬坡”与“滑坡”是生活中常见的一对反义词,它形象地表达了生活中某事物“上升”或“下降”的状况。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它更多地与道德状况联系起来。人们发问:在改革开放的中国,道德究竟是“爬坡”了,还是“滑坡”了?

持“爬坡”观点者认为,从道德的本质和趋势上看,道德正在“爬坡”。例如,人们的道德心理和行为由“假”向“真”,由“虚”向“实”,由“懒”向“勤”,由“依赖顺从型”向“独立争取型”,由封闭向开放,由单一向多元变化等等,都是这种“爬坡”的表现。

持“滑坡”观点者认为,道德“滑坡”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认真解决的时候。这首先反映在它已经广泛地渗透到社会各级权力机构之中;其次反映在影响公民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之中,资本主义早期的丑恶行为已经达到了见怪不怪的程度;再次反映在支配人们行为的价值观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从定位于群体利益的价值观向现在那种过于重视个人利益的价值观发展,以致拜金主义泛滥。

社会生活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在社会经济关系发生剧烈的变动时,道德生活的状况难以用一言以蔽之。考察整个社会生活,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对道德既有正效应,推动了道德进步,使道德在一些方面呈现出“爬坡”态

势，又有负效应，使一些缺德现象蔓延滋长，使道德在另一些方面呈现出“滑坡”态势。究竟是“爬坡”还是“滑坡”，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市场经济培育了人们的自立意识，促进了自立人格的形成。长期以来，我们实行的是传统的计划经济。尽管它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但随着实践的发展，也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人们捧着“铁饭碗”，生老病死都靠国家来解决。与这种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是‘等、靠、要’的意识，缺乏自立精神的人格。改革开放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打破了“铁饭碗”，人们主要通过自身的努力，通过诚实劳动来争取个人美好的人生。从大学生就业来看，指令性的计划分配将告别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国家指导下的自主择业，双向选择。如果大学生缺乏自立意识，面对市场经济的挑战，就难以跨出人生成功的步伐。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必然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企业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必然要精简人员。于是乎有许多职工下岗了。怎么办？国家要大力加强再就业工程建设，进行政策支持，但就职工本身而言，自立意识是再就业成功的基础。上海有一位再就业明星，她在下岗后，组织起一批下岗姐妹创立“净菜社”，热心为市民服务，受到社会欢迎。正是强烈的自立意识使她打出了再就业的新天地。自立意识与市场经济发展相伴随，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强化。

市场经济增强人们的竞争和创新意识。竞争是市场

经济的运行机制，市场经济的发展是通过竞争得以实现的。优胜劣汰是竞争机制的具体表现，商品生产者要想在竞争中稳操胜券，就必须更新技术，更新产品，才能吸引消费者，并使生产出现良性循环，不断发展。市场经济的这种客观要求，必然推动人们竞争和创新意识的增强，带来与之相适应的社会道德风尚。改革开放以来，各行各业正是在竞争机制下，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当然，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人们进一步认识到，竞争需要规范，要鼓励正当竞争，反对不正当竞争。

市场经济增强了人们的效率意识。对于一个商品生产者来说，要想获得更多的利润和利益，就必须在同一自然时间内，创造出更多的价值总量，就必须在创造同一价值总量时，耗费最小，即“以最小的耗费，取得最大的效果”。要注重效率就必须强化时间观念，加快工作节奏，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改革开放时代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益就是生命”的口号，反映了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市场经济活动中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它是对反映自然经济特征的散漫、拖沓习气和意识的冲击。时间和效益观念的增加，是道德进步的表现。

市场经济增强了平等观念与民主意识。等价交换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从一般等价物——货币为中介的等价交换，必然产生自由与平等的观念。在商品交换中，人人平等。这种平等观念的确立是对自然经济的等级观

念、特权观念、宗法观念的彻底否定,被马克思看成是人类的一大进步。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自由贸易,因而必然要冲破地域、民族、国家的界限,形成广阔的国内与国际市场。市场经济孕育了自由平等的观念,正如马克思所说“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流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①

市场经济激发了人的进取精神。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号召我们,要开拓创新,不要因循守旧。世纪之交的中国,如何根据中国的国情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有大量的课题需要我们探索。墨守成规是迈不开改革步伐的。思想要解放一点,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更快一点,就是要振奋进取精神,大胆地试验,不断地总结经验。商场如战场,企业经营者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稳操胜券,就必须大胆更新,从产品到技术,以至到设计新包装。惟有如此,才能吸引消费者,使生产出现良性循环。市场经济的发展将锻造出一大批具有进取精神的新人。

就像一枚硬币有两面一样,市场经济对道德建设既有正效应,又有负效应。这种负效应集中体现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蔓延滋长上。

在市场经济中,经济杠杆的作用离不开货币交换,金钱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市场经济越发展,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97页。

人们愈要重视和追求货币，锱铢必较，这就可能为拜金主义提供温床。有些人见利忘义，贪污受贿、卖淫贩毒、欺诈盗窃，根子都是拜金主义在作祟。在这些人心目中，金钱就是一切，什么道德法律都可以置之脑后。拜金主义是市场经济对道德建设负效应的集中表现。

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商业是生产和消费的纽带。为了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商业必须通过广告的手段刺激人们的感性欲望，达到促销的目的。市场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商品化的倾向在社会生活中日益突出。商品化更多地诉诸感性，并将造成注重感官享受的环境气氛，这样享乐主义的人生价值观就有可能蔓延滋长。

个人与集体、社会的关系是人类社会道德准则的思考常盛不衰的“中心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思考的天平往往倾向于个人利益。一些人为了自身利益的增值，甚至不惜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利益，败坏了社会风气。而小团体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则是个人主义的放大，打着小团体利益、地方利益的旗号，损害整体的、全局的利益，最终还是为了区区个人利益。

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实质上是三位一体的。个人主义是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深层次根源，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是个人主义的具体表现。一个人无限度地满足私欲，往往追求享乐、崇拜金钱。因此，我们必须同时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

市场经济对道德既有正效应，又有负效应，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为了正确地把握两者的关

系，我们必须反对两种片面的倾向。

一是只见负效应，不见正效应，将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截然对立起来而产生悲观倾向。在现实生活中，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某个时期、某个地方确实出现的道德“滑坡”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忧虑。但我们不能一叶障目，对于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正效应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以至对道德建设丧失信心。

二是只见正效应，不见负效应，将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简单等同而产生的过分乐观的倾向。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我们强调正效应，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这是必要的。但这其中也出现了对于两者关系中相互促进一面的过分乐观的倾向。忽视负效应，放松了道德建设，腐败之风就会滋长蔓延，侵蚀健康的社会肌体。物质文明‘一手硬’，精神文明‘一手软’，道德“滑坡”就会愈演愈烈。

对于市场经济对道德建设的双重效应，我们不仅要有正确的全面的认识，更重要的是要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措施，充分发挥其正效应，抑制其负效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以集体主义原则为导向，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他人利益尽可能地统一起来。

在商品经济活动中，特别是在作为商品经济发达形式的市场经济中，一只“看不见的手”会使各个经济活动主体对自身利益进行追逐。但是人们生产出来的产品只有拿到市场上进行交换，为消费者所接受，才能实现其价值，使私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这里就蕴含一个道理，

追逐个人利益与社会需求相一致时,才能获得经济活动的成功。以次充好、偷工减料以获得更多个人好处的做法,能得逞于一时,但终究难为他人与社会所容纳。我们现在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产目的最终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更要求人们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他人利益统一起来。追逐个人利益而不顾集体利益、他人利益,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不相符合,更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不相一致。

从道德方面来说,社会主义道德不排斥正当的个人利益,恰恰相反,它肯定正当的个人利益,肯定人们对个人利益的关心。列宁认为,通过人们对个人利益的关心,才能引导人们走向共产主义。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国家的经济生活中搞平均主义,在道德生活中对个人正当利益的肯定不够,但也并非完全否定个人利益。在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情况有了显著的改变。普列汉诺夫认为道德“以或多或少的自我牺牲为前提”,强调了道德的理想性与崇高性,有可取之处,但道德的自我牺牲是在特定条件下的要求,并不是普遍的要求。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主义道德要求人们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结合起来,并不简单地排斥、否定个人利益。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现在已进入了操作阶段,集体主义道德原则要真正化为人民的行动,迫切需要解决道德的知行统一的问题。

从近年来多项调查中发现,当代青年道德认识和道德行为严重背离。如果只从道德认识水平来评价,当代

青年的认识水平几乎是无可挑剔，当联系道德行为作评估，就会为两者之间的巨大反差而惊讶。例如，当调查问青年人最讨厌的社会现象是什么，‘腐败’被列为第一位，人数达 38.55%；再问如果行贿能解决你急需解决的问题你是否行贿？答“肯定不会”和“不会”的人数之和为 24.79%，而答‘肯定会’、‘看情况定’和‘说不清’的人数分别达 18.82%、34.79% 和 21.2%。再问当你在公共场合遇到违法犯罪的事情可能采取什么态度，答“主动制止”者 17.1%，答“赶快回避”、“旁观看热闹”和“等别人制止”者分别为 17.1%、1.3% 和 64.4%。这种高认识低行动、高期望低参与的状况，是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种人格畸变。道德知行统一问题在全社会有着普遍的意义，也是青年在成长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人生课题。

2. 国宝与国妖

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荀子指出：“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① 荀子在这儿区分了四种人：

第一种人，口言身行，是国宝；

第二种人，身行口不能言，是国器；

第三种人，口言身不能行，是国用；

^① 《荀子·大略》。

第四种人,口言善而身行恶,是国妖。

在对这四种人的不同评价中,荀子高度赞赏口言身行者,誉之为国宝,愤怒抨击口言善而身行恶者,斥之为国妖。字里行间,不难窥见荀子强调言行一致、行高于言的思想。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把人类把握世界的方式分为四种,即科学理论的、艺术的、宗教和实践精神的。道德作为社会意识,是一种以指导行为为目的、以形成人们正确的行为方式为内容的精神。实践精神是道德区别于其他社会意识的根本特征。当代美国著名伦理学家麦金太尔指出:“构成人类的善的是人的最好时期的全部人类生活,德性的践行是这种生活的必要的和中心的部分”。^①从一定意义上说,道德的本质是实践精神;‘德性的践行’是道德生活的‘中心的部分’。

在伦理思想发展史上,思想家总是把对道德现象的规律性认识同人们的规范性要求融为一体,形成了在传统伦理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规范伦理学体系。这种规范伦理学的特征就是强调实践性,强调人们在追求道德理想时应按一定的道德规范诉诸行动。古希腊著名伦理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其名著《尼各马科伦理学》中花了大量篇幅阐述以中道原则指导实践。他指出,我们研究道德“是为了使自己变好”,必须按照“一个共同的并且先被承认的原则”——道德规范行事。这就是说,提高道德水平,最

^①麦金太尔:《德性之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88 页。

终要落实到人们认识和实行某种道德规范上。亚里士多德的规范伦理学的内核是知行统一，他的理论观点至今仍有着广泛的影响。

本世纪初,英国伦理学家摩尔写了《伦理学原理》一书,一反过去伦理学的传统,把伦理学限定在对道德概念、判断的语言逻辑分析上,产生了所谓的元伦理学。元伦理学学派 20 世纪 30、40 年代在欧美一些国家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它的形式主义倾向使这种理论严重地脱离了现实生活。60 年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道德危机,重建道德和精神价值的呼声日见强烈。元伦理学开始衰落,而规范伦理学又出现回归。现代西方伦理学的这种曲折发展表明,应该强调完善伦理学的科学性,但不应把这种强调片面化、孤立化,忽略道德的知和行,甚至否认伦理学的实践性,从而丧失伦理学本身的意义和科学价值。

中国的文化是伦理型的文化。翻开浩瀚的古代伦理文化典籍,思想家阐述知行问题的资料俯拾即是。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知行问题不仅是认识问题,更是伦理道德问题。‘知’和‘行’能否统一是关系到做人的根本态度问题,它是古代贤哲们孜孜不倦追求的理想之一。

孔子曾多次论及学与行、言与行,即知与行的关系,都强调躬行。关于学与行,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①他把

① 《论语·学而》。

“孝”“悌”“信”等道德的躬行放在“学文”的前面。孔子担忧的是听到义后不能实行，他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①关于言与行的关系，孔子说：“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②这就是说，君子用一个词，一定可以说得出来，而顺理成章的话也一定行得通。君子要言行一致，言论不能脱离行动。孔子甚至把“言行一致”视为道德上划分君子与小人的一个标准，他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③古往今来，这一不朽名言对中华民族道德修养上的知行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中国的儒家经典之作《大学》，开宗明义地提出：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上述这段论述可概括为“三纲八目”说，核心是道德修养上的知行统一。特别是“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格物致知”到“治国平天下”这是一个认识过程，更是一个实践过程。“格物

① 《论语·述而》。

② 《论语·子路》。

③ 《论语·宪问》。

致知’是起点,而‘治国平天下’是归宿。在这一过程中知行是统一的。

当然,在知行孰难孰易、孰先孰后、孰轻孰重关系问题上也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古文尚书·说命中》记载了一段殷高宗武丁和他的大臣傅说的对话。傅说向武丁进言了一套治国方案,武丁深为赞赏,并表示要照着他所讲的那一套做。这时,傅说叩头再拜道:“非知之艰,行之惟艰。”意思是说,懂得道理并不困难,实行起来就困难了。虽然《古文尚书》是一部伪书,但这一命题的提出,却对此后千百年来中国的思想界产生过巨大影响。后来,知行的孰难孰易又与知行的孰先孰后、孰轻孰重结合在一起。尽管南宋的朱熹持“知先行后”说,但他也非常注重道德的践行。他说:“致知力行,论其先后,固当以致知为先,然论其轻重,则当以力行为重。”^①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总结了前人知行学说的得失,建立了比较系统、全面的唯物主义知行观思想体系。王夫之不仅认为知行是相互渗透的,而且还认为两者是互相转化的。他指出:“行可兼知,知不可兼行”,认定行是知的来源、基础、检验手段和目的,行对知有决定作用,行先于知、高于知、难于知。王夫之的知行学说达到了中国古代唯物主义知行学说的峰巅。从总体上看,“知行统一”贯穿于中国传统哲学之始终。

抽象地讨论知行的孰难孰易、孰先孰后、孰轻孰重的

^① 《文集》卷5,《答程正思》。

问题,似乎带有经院哲学的气味。当我们把这一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也许会豁然开朗。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提出“知难行易”,大破“非知之艰,行之惟艰”这一革命“心理之大敌”。他在 1918 年所作《孙文学说》中作了系统阐述。他认为,“天下事惟患于不能知耳”,“倘能由科学之理则,以求得真知,则行之决于难事”。在当时“知难行易”对鼓舞革命党人斗志有积极作用。马克思主义在实践的基础上把知和行统一起来,认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虽然知和行之间没有一个绝对的孰难孰易的问题,但在这循环的某一阶段中,也可能会出现知和行的难易问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发展的中国,知行问题又一次成为道德建设关注的热点。面对社会生活中泯灭良知的丑恶现象,人们在反思中不约而同地发现,产生这些现象的思想根源往往在于一些人走入了知行关系上的道德误区。这些人中,有的是缺乏正确的道德认识,更多的是把道德的追求停留在口头上,知而不行。恩格斯说:“文明时代所产生的一切都是两重的、口不应心的、分裂为二的、对立的。”^①言行不一,知行脱节,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社会的原因。要减少或者克服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言行不一、知而不行的现象,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素质,就必须抓住从知到行的发展过程中各个环节中的问题,认真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4 页。

加以分析解决。

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肯定“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的合理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轻视道德认知在道德活动中的作用。道德认知上的混乱，必然使道德活动走入误区。谓予不信，请看事实：

收受贿赂美其名曰‘操心’理应索取；
严重渎职美其名曰‘骏马也会‘失蹄’；
独吞奖金美其名曰‘反对‘平均主义’；
伸手要官美其名曰‘毛遂自荐’；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贿赂”与“操心”、“渎职”与“骏马”“失蹄”不可相提并论，独吞奖金与反对“平均主义”不可同日而语，两者有质的区别，在道德认知上一定要划清界限。

毛泽东同志说：“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①人们要有良好的道德行为，也必须诉诸理智，提高道德认识，分清道德是非，才能增强履行道德义务的自觉性。

但是，人们有了一定的道德认知，并不一定能拳拳服膺，按照已被认识的道德观念作为价值方针来抉择自己的行为。这里有一个道德情感的问题。人们对自己要从事的事情有没有感情，以及是一种什么感情，对于抉择什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1页。

么样的态度和行为有着很大的关系。人们对真理的追求总是与其炽热的情感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对道德的追求也是这样。“疾恶如仇”“从善如流”的成语表明人们对待善恶态度中有着丰富的情感成分。换言之，在生活中，人们面对复杂的客观世界，决不会是无动于衷的。人们以心理体验的方式反映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表达主体对于客体的价值态度。道德情感就是这种心理体验的方式，对人生的发展有巨大的推动力。

道德情感是通过道德认知活动的“折射”而产生的，这就是说道德情感的来源在于客体的现实，但却不是客体直接地、机械地决定的。来自外界环境的影响要经过认知加以评价，才能产生道德情感。道德情感是以一定认知过程为基础，比单纯的认知活动更丰富的价值活动。它包括在道德实践时所产生的爱慕或憎恶、崇敬或鄙夷、信任或疑虑、同情或反感、喜悦或痛苦等主观上的心理反应。在道德认知向道德行为的发展过程中，道德情感的培养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爱国主义教育，仅仅从概念到概念，难以有良好的效果。如果通过参观圆明园遗址、看电影《林则徐》等激发爱国主义情感的活动，就能更好地推动受教育者诉诸行动。而道德情感一旦形成，就具有较强的稳定性，改变旧的道德情感，需要生活实践中长期甚至是痛苦的磨练。

道德意志和信念是道德由知到行转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人们在道德实践中，必然会遇到各种阻力和困难，甚至要做出自我牺牲。没有坚强的道德意志和坚定的道

德信念,就无法冲破险阻,克服困难,战胜私欲和邪恶,成为一个具有高尚道德品行的人。孟子强调要追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道德人格,但他同时强调要磨练道德意志,才能达此目的。他说:“天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①千百年来,多少志士仁人正是从孟子的这段千古不朽的名言中汲取了精神力量,磨练了道德意志,坚定了道德信念。

黑格尔说:“主体就等于它的一连串的行为。”^②主体即人,人的一生就是他的“一连串的行为”构成的。黑格尔又说:“单纯志向的桂冠就等于从不发绿的枯叶。”^③提高道德认识,培养道德情感,确立道德意志和信念,在于诉诸道德行为,使人们按照道德理想的价值方针去行动。要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持之以恒,形成道德习惯,不仅要在职业生活、社会公共生活中,而且要在家庭婚姻生活中知行统一,践履道德规范,严以自律。

“言词是并且永远是空洞的,……人格决不是所听到的和所说出的言语,而是靠劳动和行动来形成的。因此,最重要的教育方法总是鼓励学生去实际行动。”^④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的谆谆告诫,蕴涵着深邃的人生哲理。

① 《孟子·告子下》。

②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版,第 128 页。

③ 同上书,第 126 页。

④ 《爱因斯坦文集》第 3 集,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第 143 页。